

宋詩三百首

金性堯選注

宋詩三百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宋詩三百首

金性堯選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華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插頁5 印張 14 字數 303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數: 10,001—30,000

統一書號: 10186·694 定價: 2.80元

前 言

宋太祖趙匡胤結束了殘唐五代的紛亂局面，如《水滸傳》引首所說，「一條桿棒等身齊，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」。就在公元九六〇年（即宋之建隆元年），在黃袍加身之後，一個姓趙的新皇朝，又在汴水邊建立了。

接着，在詩歌方面，亦由宋詩而承替了唐詩，並產生了不少名家與流派，以其吹萬不同、吐故納新的特色，在詩壇上各領風騷。就其中一些優秀作品來看，不外兩大特點，一是對待人民的態度，一是驅使文字的本領。

提到宋詩，就要想到唐宋詩之爭，想到宋詩在過去某些評論家眼中的可憐地位。清人葉燮在《原詩·內篇上》中曾經舉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：「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，無異唾罵。」葉燮的話並非無的放矢，但我們從這一選本的大部分作品看，即使抵不上唐詩，可是宋詩究竟是不是唾罵的對象，公正的讀者該是不難找到答案的。

每一個立國較久的皇朝的初期，總有一段相對的「國泰民安」的上升時期。宋朝亦是這樣。但由於殿堂仍在，石墜如故，祇是座位上換了些稱孤道寡的人，老百姓還是站着或者伏着等待板子，因而社會矛盾還是此起彼伏。亦因爲這樣，一些還肯爲老百姓說話的人，還是拿起筆，寫出人民

所期望的作品。這時候，離開杜甫的時代已經二三百年了，但仍然有人以民間涕淚來蘸他們的筆端，例如本書第一篇王禹偁的《感流亡》（它和王氏另一篇五古《對雪》可稱爲姊妹篇），以及梅堯臣的《田家語》、韓琦的《廣陵大雪》、蘇舜欽的《吳越大旱》等等。從這些作品中，反映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：在宋朝建國後七八十年間，就在西北、東南、中原地區，老百姓已經在邊患、天災、苛政下喘息了。

這些作者都是富有知識的封建士大夫。在士大夫階層中，固然有不肖之徒，然而社會生活中黑暗腐敗的現象，下層人民的苦難，反應得最敏銳的，往往亦是士大夫中清醒的明智的一部分。由於他們較多地接受了前代文化傳統中民主性部分，加上自己的社會實踐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還是具有一定的正義感，因此作品較多地流露着關懷人民疾苦的感情，儘管他們的動機是爲了「忠心報答趙官家」。還應當指出，他們作品中悲天憫人的描寫，有些人祇是一種姿態，有些人是廉價的，這樣的作者歷來就有，但有些人確是把自己的真實感情進入形象的。那些假那些真，公正的讀者自會從這些作家的作品中予以區別的。

下面試把宋詩中各個階段的動態，或擇有代表性作家的優缺點，或就其事跡中一二要端，或據某一流派的得失，略加串綴。爲了避免與「作者介紹」或「說明」重複，祇好此詳彼略地作爲補充來說。

在王禹偁、梅堯臣、蘇舜欽等人活躍於文壇的時期，正是西昆體盛行的時期，王禹偁雖以其警

秀與平易給宋詩帶來一些新氣息，但一則尚存唐音，二則並非有意識地反對西昆，故影響不大。到了梅堯臣、蘇舜欽纔有意識地與西昆抗衡，就象葉燮在《原詩·外篇下》說的，「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，始於梅堯臣、蘇舜欽二人」。可是他們當時的文名不高，號召力有限，能够起有力作用的却是歐陽修，給歐陽修以有力支持的是梅、蘇。

歐陽修以其政治地位和學術聲望，在文學革新運動中產生了重大影響，成爲當時文壇的領袖。在語言的使用上，亦比梅、蘇流暢自然。他對西昆派楊億等人的文采有所稱贊，對西昆那種文風和傾向則頗爲不滿。這種態度亦是對的。當時一些有成就的作家，又多出於他的賞拔，如王安石和三蘇。

附帶還要提一筆，石介亦是一個反對西昆最激烈的人，除了寫論文《怪說》外，還寫過五古《蝦蟆》來諷刺。但他自己寫的詩却藝術價值較差，語言缺乏感染力。

王禹偁、歐陽修等人都曾經遭受過貶逐，他們的好些佳作即成於貶逐途中。王世貞在《藝苑卮言》卷八中說：「今夫貧老愁病，流竄滯留，人所謂不佳者也，然而入詩則佳。」苦酒會使詩味加醇。詩人們在政治上的挫折，却得到了藝術上的補償。一個真正有才能的詩人，他的最寶貴東西是永遠不會丟失的。

王安石是受知於歐陽修的人，他的《奉酬永叔見贈》中就有「樞衣最出諸生後，倒屣嘗傾廣座中」的話。歐陽修死後，學識聲望能和安石匹敵的祇有蘇軾。王安石的詩，古風與近體都好，晚年

罷相時作的幾首七絕尤爲精采。嚴羽《滄浪詩話·詩體》列有「王荆公體」，並說「公絕句最高，其得意處，高出蘇、黃、陳之上，而與唐人尙隔一關」。說得很中肯。這裏略舉幾首爲例：如《謝公墩》的「公去我來墩屬我，不應墩姓尙隨公」（注一），《孟子》的「何妨舉世嫌迂闊，故有斯人慰寂寥」，《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》的「除却春風沙際綠，一如看汝過江時」。第一首雖是遊戲之作，却反映了他的倔強性格，亦即拗相公性格。第二首是說，在古人中，真能引爲知己，慰他寂寥的唯有儒家孟子。第三首因送弟而念女，以自然樸素的語言，寫老父的深摯感情。本書中還選有利登的《次琬妹月夕思親之什》，末兩句云：「白頭親老今多病，不似當初別汝時。」亦是以常語寫真情的好詩。這些詩固然祇是寫骨肉之間的聚散，却是天生的好題材，寥寥二十八字，容不得半點浮文。誠然，詩人應當向更廣闊的天地馳騁，但反過來說，一個詩人，如果連這樣的抒情小詩亦寫不好，就不免要替他着急了。

由王安石就很自然地想到司馬光。二人政見各異，由此而產生的新舊黨爭，此起彼落，很爲激烈。我們不否認司馬光有保守的一面，但人品還應當肯定。思想保守和品德可風的矛盾，這樣的政治家在古代就爲數不少。平心而論，所謂舊黨成員的品質要比新黨好些。他不以詩名，有幾首却有針砭意義，如本書所選的《鷄》詩。

但給宋詩面目以最大變化、成爲北宋詩歌之魂的是蘇軾。

黃庭堅在《子瞻詩句妙一世……》中說：「公如大國楚，吞五湖三江。」這話不算怎樣誇張。觀

於海者難爲水。儘管這個選本中他的詩選得最多，還是感到非常遺憾。

他是個大起大落的人，性格爽朗，直道事人。對王安石，他曾說過：「東南數起大獄，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？」司馬光常被章惇譴侮而感到苦惱，蘇軾即向章惇說：「許靖且不可侮，況君實乎？」後來司馬光拜相，蘇軾曾以差役、免役的利弊與他爭執，司馬光爲此而感到忿然，蘇軾又說：「當年你不顧韓魏公（琦）的不高興與他力爭，豈今日作相，不許軾盡言耶？」（注二）這兩件事情，最能說明他的梗直。其次，他又善於吸收異端思想。佛道的思想，在他人生觀上也許帶來虛無的影響，在創作上却發揮了美感的效果，例如散文的《赤壁賦》，七古的《百步洪》。他走過許多路，大塊假之以文章；天地爲他留下風月，江山爲他留下勝蹟。他亦沒有辜負它們。晚年從嶺外歸來後，曾作《次韻江晦叔二首》，其中云：「浮雲時事改，孤月此心明。」胡仔在《荅溪漁隱叢話·後集》中說：「語意高妙，有如參禪悟道之人，吐露胸襟，無一毫窒礙也。」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卷十八，亦說這兩句可以「見東坡公之心」。蘇軾一生可愛處就在於通體透明，好好壞壞都讓人看得清楚。這首詩作於逝世那一年，他的生命快要完盡了，他的這顆心依然放着光，象天上明月那樣永遠放着光。

黃庭堅是蘇門四子之一。他在技巧上確實下過一番功夫，自己還有「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」之類的主張。後人對他的詩評價不一，但有一點值得說一說的，這便是作爲一個詩人，他應該如何在語言上苦苦追求魅力，苦苦創造特色，一定要有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決心。努力屏除陳詞濫

調，毫不留情地扔掉「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」（注三）這一類惰性的語言。如果語言無味，又怎能使人對他的作品感到面目可愛？當我們看到某些詩篇中陳陳相因的太倉之粟時，就會想起黃庭堅。但話雖如此，實踐的結果，往往會造成另一種傾向，即奇拗艱澀。蚌病成珠，優點和缺點常常如影隨形。如同宋詩的短處是議論化，但說理細密又是它的長處。黃詩所以引起後人評價紛歧的原因之一就在這裏。金代王若虛的《滄南遺老集》中就把他說得一無是處，亦有點過分。如卷四十四云：「秦穆公謂蹇叔曰：『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。』蓋墓木也。山谷云：『待爾成人吾木拱。』此何木耶？」毋乃苛求。古代詩文中，木與拱連用的，即意味着是用《左傳》中的墓木典，何況還有上下文。如果黃詩運用墓木，卻又顯得直拙，說不定王氏又要問：「此何人墓木耶？」但王氏有一段話却說得很中肯：「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，有斬絕而無橫放，鋪張學問以爲富，點化陳腐以爲新，而渾然天成，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。」從黃詩總的成就來看，他所換之骨，所成之金並不多，使我們欣賞的還是「桃李春風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燈」和「落木千山天遠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」，而不是「百葉緜梅觸撥人」和「馬乾枯黃暄午枕」之類。

陳師道和張耒亦是蘇門中人，北宋後期的詩壇中，除蘇、黃外，亦以陳、張成就和影響最大。師道身世窮困，性格孤傲，常以樸拙瘦硬的語言表現出他的力度。在不甘與流俗苟合上，他的態度是鮮明的，但作品亦缺少壯闊的波瀾。因爲閉門覓句，黃庭堅甚至把他稱爲「逸民」。其次，他在學杜上用過力，但王世貞在《藝苑卮言》卷四中，曾舉陳詩用杜句而點金成鐵處，如杜云「文章千古

事，陳則云「文章平日事」，杜云「乾坤一腐儒」，陳則云「乾坤著腐儒」，杜云「寒花祇暫香」，陳則云「寒花祇自香」。（王氏所舉尚不止這幾個例子）這亦大出於我們意外：一個極平常的詩人都不屑爲的事情，怎麼會出現在苦吟詩人身上？亦實在是未能一空依傍的表現。

張耒是蘇門諸人中死得最遲的一個。他的《夜坐》中末兩句云：「梧桐直不甘衰弱，數葉迎風尚有聲。」他當然是有寄託的，但我們似亦可用來比喻他晚年在北宋詩壇上的地位：蘇軾、黃庭堅、陳師道都先他而去了，詩壇顯得冷落，他還是要以樸實的語言，爲人間送來秋聲。

他生活過朝政日益敗壞的徽宗後期，作品中就有不少是反映社會生活的，如《和晁應之憫農》云：「爲盜操戈足衣食，力田竟歲猶無獲。飢寒刑戮死則同，攘奪猶能緩朝夕。」正是六賊橫行，民不畏死那樣時代的真實寫照。他又善用襯筆，如《輸麥行》，主題是寫農家收割後的歡樂氣氛，却插入「半歸倉廩半輸官，免教縣吏相催逼」，就從側面透露了農民對官府的心理：即使在大家喝酒聯歡的時候，仍然有一種壓力在心頭。

黃庭堅祇比張耒早死七年，經歷要比張耒艱苦，但他詩中反映的社會內容就不如張耒深廣，可見詩人對現實的認識深度，還取決於自己的主觀。

二帝北去，萬馬窺邊。陳與義是由北宋進入南宋的一個詩人。他祇活到四十九歲，在南宋亦祇生活了十二年。但在詩的成就上，這十二年遠勝於他的前半生。他的五律，如《舟抵華容縣》、《晚晴野望》等都得很得杜甫之神，「兵甲無歸日，江湖送老身」，就直逼老杜，這亦由於兩人同因

喪亂而間關流離之故。七律當以登岳陽樓幾首爲代表。總之，由北宋而南渡的愛國詩人中，在骨力和音節上，要推陳與義最有特色，享名最盛。

陸游是在陳與義逝世前十四年出生的。

陳與義在世時，韓世忠、岳飛還在和金人作戰。可是他死後四年，岳飛被殺了，韓世忠罷官了。又隔了二十餘年，金宋就成爲叔姪之國了。這些或許出於陳與義意外而爲陸游所得知的。即是說，南宋蒙受的苦難與恥辱更深重了。其次，陳與義雖身經靖康之變，備嘗流離之苦，畢竟祇是被動地過着逃難生活，行踪亦祇在中南東南一帶。陸游却以書生從軍西北，要實現他上馬殺賊的志願。劍門道的細雨，大散關的秋風，歸州城的灘聲，他都消受了。這裏祇舉一個例子：他在成都山南打獵時，居然給他射殺一隻猛虎。當他把死虎拖回來時，就有千百人夾道而觀，他並把這一舉動看作是爲孤兒寡婦報仇。象這樣不平常的生活，又豈是一般文弱書生所能經歷的？對他的創作自必起了強大的力和美的作用。加上南宋政局的激蕩飄搖，更使他的作品縱橫起伏，與時代密切結合，成爲南渡後詩壇的一座長城。

選錄在本書中的陸詩數量，僅次於蘇軾，同樣感到遺珠過多，例如他懷念唐琬的詩，每一首都用最真摯感情寫的，但本書祇能選兩首（沈園）。

范成大的好詩，自然不僅僅是那些田園詩，這裏且就他的田園詩略說幾句。

從陶淵明以來的不少描寫農村生活的詩中，首先使我們感嘆的，在千百年歷史長河中，中國

農村面貌竟是改變得這樣緩慢，總是靠幾條牛，幾把鋤頭在過日子，逢到旱災水災總是要請龍王爺開恩顯靈。「田家豈不苦，弗獲辭此難」，陶淵明這兩句詩，在千百年後仍然是至理名言。在范成大的田園詩裏，那種自然經濟下的農村面貌，固然大同小異，但有一個顯著特點，即比起其它詩人來，他和農民之間的距離要縮短些。他的那些詩，都是在石湖時觀察體驗的成果，但亦因為對農村有興趣有感情的緣故。他的一部分詩歌，常有用典多與拗口的缺點，但六十首《四時田園雜興》，讀時却用不着翻辭典，就憑他的清新和親切，寫出土膏露氣之美，彷彿生活在到處挑動他，有的就象和村中的童叟在對話。「身外水天銀一色，城中有此月明無？」是的，即使是一灣水，一輪月，城市中又哪裏有可與兩蚤相語的秋之鄉村相比？

楊萬里的詩，比起陸游、范成大來，思想性要差些，在語言的創新上，却比較大膽。《滄浪詩話·詩體》祇列誠齋體而未列放翁體、石湖體，就因為「別出機杼」之故。在南宋詩人中，從語言的出奇制勝看，他是最突出的一個。在寫作的手法上，他又以靈活敏捷著稱，如《凍蠅》的「日影欲移先會得，忽然飛落別窗聲」，《寒雀》的「特地作團喧殺我，忽然驚散寂無聲」，兩處都以「忽然」兩字來表現這些小動物的動作，對詩人視覺器官一剎那間的刺激作用。

楊萬里是一個經師，《宋史》入《儒林傳》，他在《庸言》中自稱「楊子」，做起詩來，却有「生擒活捉」那種氣魄。但他過於追求「活法」了，因而亦帶來滑和濫的缺點，好多地方，「活法」成爲一種賣弄。

尤袤被稱爲「中興四大詩人」之一，但他比起陸、范、楊來，質量數量都差得遠，我把他的《梁溪遺稿》翻閱了三遍，祇能選上兩首。相反，前人說「恨曾子固不能詩」的曾鞏，本書中選了五首，覺得還可選一二首。

永嘉四靈是繼中興四大詩人之後的一個流派。「四靈」的創作活動時期爲南宋後期，他們在鐫句煉字上，亦有其自己的特色。但這一時期的政局，文官愛財，武官怕死的現象更突出了，對外則以屈辱苟安爲能事。我們祇消舉一個具體例子就可以說明：南宋政府爲了滿足金人的予取予求，竟將主張北伐的已故韓侂胄首級，開棺斬下送給金人。韓氏爲人如何，北伐動機如何，這裏暫不詳論，但這一事件却說明了南宋政府已淪落到什麼樣地步？當時王介（一說是倪思）就說「韓首固不足惜，而國體爲可惜」。政局敗壞如此，民間苦痛更可以想見。四靈派的詩歌裏，却絕少有對這種殘酷現實的揭露諷喻之作。這並不是說，在國難深重時節，就不應該寫流連光景的作品。歷代詩人中好些描寫山水田園的優秀作品，就有不少是成於山河破碎之日，例如陸游。但他們還有哀念民生、痛心時事的另一面。即使身在山林，所見所聞，亦有許多可以激發義憤和敵愾的社會現象。可是我們在「四靈」作品中，見到的祇是他們大同小異的藝術面貌，而看不到萬方多難的時代面貌。

稍後於「四靈」的江湖派，亦是反對江西派的。據《滄浪詩話》詩辨說，江湖派多效法四靈派。他們人數衆多，有的作品和「四靈」無甚區別，但象戴復古、劉克莊，却是此派中的健者，常以

其實直的文筆，或諷世態，或抨莠政，在南渡的江湖邊，使人們看到的，並非全是清澈和平靜，却還有浪濤與塵沙。

在劉克莊的《北來人》、《戊辰卽事》諸作中，侵擾南宋的胡騎還是金人，但到他逝世七年後（一二七六），另一個更強悍的敵人蒙古，便攻陷了臨安。南宋已不可能再象向金國那樣以稱姪而苟安，而是由一個六十多歲的太皇太后謝道清具降表向新朝自稱臣妾。

這時在宋末詩壇上，能够反映悲壯剛烈、辛酸屈辱的複雜的歷史真實的，就是文天祥、謝翱、謝枋得、汪元量等人。錢謙益在《胡致果詩序》中說：「唐之詩入宋而衰，宋之亡也，其詩稱盛。」即指謝翱、汪元量等。但唐之亡與宋之亡是不同的，亦即顧炎武《日知錄》中所謂亡國與亡天下之分。

岳飛在大理寺獄中有沒有寫過詩，今天已無法知道，但文天祥從兵敗被執直至就義前，却留下不少好詩。古人詩歌中，能够表現人的堅強意志的，文氏有些詩是最有代表性的。臨安淪陷前，他和汪元量本不在一起，後天祥被囚於大都獄中，元量曾去看望他。天祥殉國，元量又作詩挽之。元量最精采的作品，自然要推《醉歌》和《湖州歌》。自元兵南下至帝后被迫北遷這一段淒涼史事，他都詳晰地以歌行寫了下來。又如《宋宮人分嫁北匠》的五古，寫國亡後宮女的命運亦極為沉痛。國母已自稱臣妾，宮女自亦祇好任人分配。如果不是篇幅的限制，象汪氏這樣的詩，選上十餘首亦不嫌多。謝翱等人，在當時冷落的詩壇中，就象子規啼月那樣，以其淒清的啼聲，為荒涼

的暗夜山林一破寂寥，行人到此，就要回過頭來聽聽。還有一個蕭立之，他在宋亡後作的《送人之常德》中，就勸友人趕快去作避秦的桃源中人，再亦不要回到污濁的塵世來了。

前面這些話，嚴格說，實在談不上「前言」，祇是選注之餘的一些札記，下面再說一說編選的意圖。

宋詩的數量比唐詩多出兩倍，僅陸游一人就近一萬首。這一選本號稱三百首，實際選錄的為三百三十七首，已與書名不很符合，可是割愛的不知多多少少。每當選完一位作家的作品後，號稱大家的不必說，就是稍次的亦覺得顧此失彼，怎麼也擺不平，心裏總對他們感到不周到。

朱自清先生在《什麼是宋詩精華——許石遺老人（陳衍）評點宋詩精華錄》一文末段，有兩句很風趣的話：「讀此書如在大街上走，常常看見熟人。」我選本書，大體上亦是讓大家在大街上看見熟人，不過，又保留一點餘地，讓讀者進入小街僻巷，和陌生人見見面。即既有重點地保證了「主」，又有控制地吸收了「次」。

另外還有一個似乎不成其為理由、又好象可以成爲理由的理由，就是想照顧到各個方面。

例如（一）包拯，本非詩人，詩亦僅此一首，就因爲他是包拯的緣故，使大家知道包公還寫過這樣一首詩，姑且以人存詩，但他在宋代詩壇中，祇能算是陌生人。亦有以事存詩，如宋祁的《九日食糕》。

(二) 近人論宋詩的著述中，亦有將理學家詩專列一項，滄浪詩話·詩體中卽列「邵康節體」。唐順之在與王遵巖參政信中甚至說：「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，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。」這話當然有點偏，却說明邵詩很有影響。水滸傳一開頭，就引用他的一首七律。本書中的劉子翬，亦是一個理學家，但選錄時祇是從詩人角度考慮，朱熹亦是這樣。純粹的理學家如周敦頤、二程等，實在選不出好詩，故選邵雍爲代表，並特選他的插花吟。

(三) 若溪漁隱叢話·後集引詩說雋永云：「今代婦人能詩者，前有曾夫人魏，後有易安李。」曾(布)夫人詩已佚失，宋代女詩人詩可選的祇有李清照與朱淑真。李詩流傳的很少，朱詩數量較多，却流於淺率。但在宋詩中，表現婦女戀愛生活的本來不多，朱詩却以婦女自己來表現其歡樂和感傷，而且在禮教勢力下還算有勇氣的。

(四) 宋初有惠崇等「九僧」，本書中未選，選的是惠洪和如璧(饒節)，他們其實是穿袈裟的詩人，惠洪尤其有才氣。

(五) 西昆之弊，學者評之已多，從另一角度看，這種文體的形成，還多少反映宋朝開國初期的上升氣象。不管怎麼說，它總是代表當時詩壇上很有影響的一種流派，而且少數幾首亦可以讀，例如楊億的名篇漢武。還有少量的香奩體和宮體詩，亦是爲了聊備一格。

(六) 如果拿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的選目來對照，本書中未選的就是皇帝的詩，這倒並非故意不選，而是宋代皇帝作詩本領差。汪元量集中曾錄有宋幼主趙昰(瀛國公)於宋亡後送元量

南還詩云：「寄語林和靖，梅花幾度開。黃金臺下客，應是不歸來。」詩還寫得好的，但真偽難知。

加工方式，大致與《唐詩三百首新注》相同，所收前人評語略有增加。這些評語的作者，同時又是很有欣賞能力的讀者。一首精心寫成的詩，能够得到這些評論者的關心，祇要不帶偏見，即使評論得尖銳些，總是高興的事。他們的高超的欣賞能力，同樣為我們所欣賞。

但不管是怎樣傑出的詩人，他們畢竟是一千年前的人了，思想感情方面，很難完全擺脫歷史老人的束縛，對他們過高過低的褒貶都未能安長眠的古人於地下。話雖如此，要非常穩當地掌握這一分寸，却又行之維艱。無論是對作品的取捨或對作者的評論，在很大程度上總含有見仁見智的個人主觀因素。

宋詩是承上啓下的。「樂意相關禽對語，生香不斷樹交花」，在選注過程中，常常想起石延年《曼卿》《題金鄉張氏園亭》這兩句名句，並深信這一詩歌傳統將會永遠沿流下去。

本書的加工開始於一九八四年四月，至今恰值一年。從農曆說，亦正是楊柳依依的「二月春風似剪刀」的時候。江南的兩個仲春之夜，都在我筆下脈脈流過了。老歸故紙，人間一樂，屬稿既竟，星斗滿天。唯一感到遺憾的，友人楊廷福已無法見到此書了，他當初是殷勤鼓勵過我的。「故人墳樹立秋風」，謹誌於此，亦聊申掛劍空壠之忱。

金性堯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